

18世紀經由琉球途徑的清日文化交流*

沈玉慧**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609年遭薩摩藩出兵的琉球，爲了追求本國的自主性，及避免觸發清日間可能的體制衝突，自明清交替以來逐漸採取嚴格的隱蔽政策。中介於中日之間的琉球，爲了因應薩摩藩與江戶幕府的需求，不僅居中傳遞情報、商品、文物、技術等，甚至中介雙方的文化交流活動。不同於情報、物品的傳遞，文化交流更仰賴人際網絡，因而亦見清朝官員也參與其中，成爲中琉日往來途徑的重要元素。本文藉由17世紀以來此一途徑的發展，考察琉球透過土通事、冊封使節等官員所進行的清日文化交流事例，進而分析清朝官員於其中扮演的角色，探討中琉日交流網絡的形成、內涵及其意義。

關鍵字：近世琉球、中介交流、土通事、冊封使節、交流網絡

* 本文爲日本交流協會招聘活動及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17-19世紀東亞國交關係再探——以中琉薩日交流網絡之形成與運作爲例」（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005-048-MY3）之研究成果。另，由衷感謝匿名審查人給予本文詳盡的指正與建議，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 E-mail: shenyuhui@dragon.nchu.edu.tw

收稿日期：108年2月11日；接受刊登日期：108年11月18日

壹、前言

自 1547 年¹最後一次的勘合貿易結束後，歷經明清交替，至 1871 年締結中日修好條約為止，清日間的往來主要是透過華商前往長崎貿易，以及委由華商、朝貢國送還漂流民（劉序楓，1999；荒野泰典，1988；劉序楓，2002）。文化交流方面則有清朝商人居中協助購買書畫，延攬醫師、畫師等清人赴日，或是具詩文繪畫能力的清朝商人與日人直接交流（大庭脩編著，1967；馬成芬，2017；鶴田武良，1993）。

除此之外，琉球亦是清日文化交流的途徑之一。1609 年琉球遭薩摩藩出兵入侵成為其「附庸」，受到嚴厲監管，其後並被視為幕藩體制下的「異國」，為了追求本國的自主性（渡邊美季，2018: 57），²以及避免觸發中日兩國對外體制可能的衝突，琉球於明清交替期間逐漸採取嚴格的對日關係隱蔽政策（渡邊美季，2012: 213-253）。³

琉球自明清交替期以來，為了因應薩摩藩與江戶幕府的需求，居中扮演傳遞情報、商品、文物、技術的中介者，至清朝統治及清琉關係逐漸穩定、日本對清朝的認識由具貶抑之意的「韃靼」轉變為「大清」後（劉序楓，2018），薩摩藩與江戶幕府甚至企圖利用清琉間的封貢關係，和清朝展開文化交流活動。

相較於情報、商品、文物、技術的傳遞，中介清日間的文化交流極有可能暴露琉球與薩摩藩、江戶幕府間的往來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於琉球中介清日間的文化交流活動時，亦可見土通事、冊封使節等清朝官員予以協助，顯示清日的文化交流並非單純地透過琉球中介，清朝官員亦是構成清一琉一

1 文中使用西元紀年及阿拉伯數字月日皆為陰曆。

2 琉球追求自主性之舉包括未經薩摩藩或江戶幕府的同意，先行應允清朝要求，直接將清漂流民送回清朝，事後以為維持對清往來為由，迫使薩摩藩或江戶幕府追認（渡邊美季，2018: 57）。

3 另據渡邊美季（2018: 56-57）指出，汪楫前往琉球冊封期間要求設立學校，甚至出資設立關帝廟等，協助強化琉球「中國化」或「儒教化」的態度，是影響琉球積極展開嚴密隱蔽政策的重要因素。

日文化交流途徑中不可忽視的元素之一。

惟對此之相關研究多關注琉球的中介機能，如薩摩藩、江戶幕府經由琉球取得中國書畫（眞榮平房昭，2006；2001），或經由琉球傳入福州、杭州的畫風等（黃立芸，2015；2013），甚至影響京都寫生畫的成立（平川信幸，2019: 35）。透過琉球展開清日文化交流之相關研究，現僅見劉序楓介紹第六代幕府將軍之侍講新井白石與清翰林院編修鄭任鑰交流之例（劉序楓，2018: 119-120）。

有鑑於琉球中介清日文化交流，不同於情報或書籍、書畫等物品的傳遞，更仰賴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關係，因此透過考察相關事例，將有助於掌握參與其中的人員，了解其交流關係，進而具體建構交流網絡。此外，透過探討、掌握此一交流網絡，亦有助於瞭解清日文化交流的多元面向。對此，本文將透過 17 世紀以來琉球途徑的發展，考察琉球透過土通事、冊封使節等官員所進行的清日文化交流之例，分析清朝官員於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討中琉日交流網絡的形成、內涵及其意義。

貳、17 世紀以來中日琉交流途徑的演變

中日兩國除直接往來之時期以外，主要仰賴朝鮮、琉球等中介。1372 年琉球遣使明朝後，明朝因倭寇等問題對琉球採取優遇政策，琉球不僅因此開啓其大交易時代，成爲東亞海域的貿易轉運站，也因此成爲中日間貿易、外交交涉的中介者（曹永和，2000；赤嶺守，2004: 32-48）。至 16 世紀末，琉球即便失去了轉運地位，仍於朝鮮之役期間提供日本情報（沈玉慧，2007: 162-169；鄭潔西，2010a: 64-67），甚至協助戰爭期間前往日本蒐集情報，遭風漂抵薩摩藩的明朝間諜返國。⁴ 至 1609 年琉球遭薩摩藩入侵後，其往來途

4 該名明朝間諜爲史世用，其在琉球的協助下返回明朝後，亦提供豐臣秀吉要求琉球協助出兵朝鮮，及琉薩間的路程等情報，該紀錄見於沖繩縣立圖書館編（1992: 214-215），相關研究參見增田勝機（1999: 7-64）、鄭潔西（2010b: 118-119）。此外，明清交替期間唐王亦曾透過出身福建福清的周鶴芝前往薩摩藩乞師請援（黃宗義，1993），足見薩摩藩與福建地區往來密切。當時對於薩摩多以其發音記爲「撒斯瑪」，加上漂抵九州南部的漂流民所提供的相關訊息及走私貿易活動等，皆可能影響福建地區對於薩摩的認識和形象建構，此將另文討論。

徑的發展主要受到薩琉、日琉關係及中國局勢變化之影響，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 1609～1640 年代：1609 年琉球遭薩摩藩入侵並受其監管後，初期薩摩藩對琉球採取同化政策；然隨著琉球中介對明交涉失敗，明朝令琉球十年後再貢（沖繩縣立圖書館編，1992: 584），其統治方針則轉變為使琉球成為表面「自主之國」（鹿兒島縣歷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1984: 818-819）。薩摩藩為了有效監管，並透過琉球掌握中國情報，陸續訂立各種遣使名目，如國質使、通報使、年頭使、慶賀使、吊祭使、香典使、慰問使、謝恩使、捷報使及仰上使等。⁵

隨著薩摩藩對琉球嚴密監管，琉球對薩摩藩的遣使亦逐漸確立，如 1622 年起幾乎每年派遣「年頭使」（深瀨公一郎，2004: 202）。此外，1634 年 2 月起琉球於幕府將軍襲位、琉球國王即位之際派遣慶賀、謝恩使前往江戶（深瀨公一郎，2004: 210-241），加上同年 8 月幕府將軍頒給薩摩藩的領知判物中明記「薩摩、大隈兩國并日向國諸縣郡，都合六拾万五千石余目錄在別紙。此外，琉球國拾貳万三千七百石事，全可有領知之狀如件」（鹿兒島縣歷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1985: 444），即自 1609 年薩摩藩出兵琉球後，亦於琉球施行幕藩體制的檢地、納貢制度，透過幕府頒予薩摩藩的領知判物確認了幕藩體制下，幕—薩—琉之序列關係。惟領知判物中雖明記琉球應繳納之石高，但不同於各藩，不對琉球課徵軍役（鹿兒島縣歷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1985: 419-421；木土博成，2016: 529-533），琉球因而被視為幕藩體制下的「異國」（高良倉吉，1987: 361, 365；紙屋敦之，1990: 18-45），琉薩日之往來途徑亦因此逐漸確立。

5 有關琉球遣使至薩摩藩的紀錄主要見於《大和江御使者記》和《中山世譜·附卷》，其中年頭使每年年初赴薩摩藩問候藩主島津氏後，即以在番親方之身分任職於薩摩藩之琉球館，擔負與薩摩藩交涉的任務（沖繩縣立圖書館編，1992: 584）。另根據深瀨公一郎（2004）一文中的「上國使者一覽年表」，至 1640 年為止，年頭使多於 1-2 月出使，並多於同年秋冬返回，1640 年代起則多為 4-6 月出使，隔年 9-11 月返國。又《大和江御使者記》記載迅速通報南明使節、冊封使節來琉、異國船隻漂抵琉球、薩摩藩藩主或琉球國王逝世等使者為「飛腳使」，《中山世譜·附卷》則記為「為捷報……事」，因此稱作「捷報使」（飛腳使）。詳細統計內容參見深瀨公一郎（2004）。

(二) 1640～1670 年代：1644 年李自成率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清軍入關，南明政權更迭。明清交替時期，琉球對南明勢力、清朝採取兩面外交，因而成為薩摩藩、江戶幕府取得中國情報的重要途徑。如 1649 年自清朝返國的琉球使節，分別前往薩摩藩、江戶通報明清交替之事（球陽研究會編，1972: 156-157）。⁶ 遣使薩摩通報中國情報的「通報使」便於此時制度化（深瀬公一郎，2004: 204）。

(三) 1670 年代末以降：隨著明清交替的局勢逐漸明朗，琉球開始對清朝展現忠誠之意，如三藩之亂期間遣使探問清朝安否（蔡溫，1972: 123），1680 年遣使清朝，積極與清朝建立封貢關係（蔡溫，1972: 124）。對此，清朝雖得知琉球與反清勢力往來，然考量當時須有忠誠的朝貢國以強化政權之權威與對外往來的穩定（渡邊美季，2012: 114-122），因而於 1682 年命汪楫、林麟焜出使琉球（覺羅勒德洪等奉勅修，1986: 25），並首開先例特賜「中山世土」之御筆匾額（汪楫，2000a: 865-866），且同意冊封使節返國後代為提出的派遣官生入北京國子監就讀之請（覺羅勒德洪等奉勅修，1986: 201-1），此後琉球亦頻繁地派遣勤學前往福州，⁷ 清琉間的朝貢冊封關係確立。

加上前述琉球遣使薩摩藩和江戶幕府之舉亦陸續制度化，北京—福州—琉球—薩摩—江戶之交流途徑確立，琉球即成了薩摩藩、江戶幕府取得清朝情報、商品、文物、技術等的重要中介點。尤其自 1714 年起主要擔任赴清的正議大夫、都通事、在船都通事、存留通事等職的久米村人，亦開始出任江戶使節，薩摩藩、江戶幕府便曾多次透過琉球取得清朝情報，如 1796、1806 年薩摩藩士和幕府儒官皆曾向琉球使節詢問出使中國之事（赤崎貞幹，

6 當時中國情報之紀錄收錄於林春勝、林信篤編（1958），相關研究參見上原兼善（1981）、喜舍場一隆（1993: 571-608）、薛明（2014: 147-164）。值得注意的是，該次使節原為前往慶賀福王即位，但出使任務完成後於福建出航返國之際，先後遭遇海盜襲擊及清軍攻入福建，當時琉球使節敬髮拜見貝勒將軍博洛，而後再前往北京謁見康熙帝。其中「敬髮」之「敬」為「歆」之異體字，據於 18 世紀中編纂的琉球史書《球陽》的記載，「王右鬢上，有瘤如角，常髻於右邊，以掩其瘤。及就王位，國人皆法之，皆結敬髻」（球陽研究會編，1972: 156-157），「敬髮」應為琉球之髮髻。雖然之後可見琉薩幕對於如清朝要求琉球應施以清俗，即薙髮一事進行議論，因此亦有自行薙髮拜謁貝勒將軍博洛、康熙帝之可能性，但並無相關記載佐證。

7 據前田舟子（2014）之統計，清代琉球總計派遣約 280 名勤學。

1797；眞榮平房昭，2007；紙屋敦之，2013；成島司直編，1806）。此外，積極吸取本草學、醫學及蘭學等各種學問的薩摩藩第八代藩主島津重豪（1745-1833），亦曾利用琉球遣使赴清的機會蒐取本草、藥草的相關知識（吳繼志，2013；高津孝，2010: 27-41）。⁸ 可知隨著三方關係的穩定，清一琉一日之交流途徑確立，經由琉球所傳遞的中國情報、知識、文物、技術等日趨多元。

參、18 世紀琉球與清日文化交流之事例

如前所述，隨著清朝的統治穩定，日本對於清朝的認識也產生轉變，如用來指稱清朝的語彙從明清交替時帶有貶抑之意的「韃靼」轉變為「大清」，「韃靼」一詞則轉變為地理名詞，並出現崇尚清朝文化風俗之現象（劉序楓，2018: 109-117），薩摩藩與江戶幕府因而出現透過琉球要求與清朝文人、官員進行文化交流之舉。然此類要求不僅可能使琉球與薩摩藩、江戶幕府間的往來檯面化，且對於實行嚴厲的日琉關係隱蔽政策的琉球而言，單憑自身之力難以完成，須清朝官員給予協助。以下即透過兩則交流事例，一探協助琉球的清朝官員之身分及其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一、新井白石與鄭任鑰⁹

此係六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宣之侍講新井白石與清翰林院編修鄭任鑰的交流事例，即新井白石的詩集《白石先生餘稿》中收錄了鄭任鑰〈白石先生詩序〉。據同書中幕府儒官室鳩巢（1658-1734）¹⁰〈題清鄭任鑰所序白石餘稿〉所述，此次的交流經緯為 1710 年新井白石透過深見玄岱（1649-1722）¹¹ 請託

8 該書為《質問本草》，刊行本之作者記為吳繼志，但吳氏乃架空之人物（吳繼志，2013: 70），據推測作者為程順則、村田經船、島袋憲紀、曾榮、吳俊藏等人（高津孝，2010: 41）。

9 有關鄭任鑰的生平參見劉序楓（2018: 119-120）。

10 室鳩巢，字師禮，號鳩巢、滄浪，1711 年獲新井白石推舉成為幕府儒官（室鳩巢，1991: 2-11）。

11 深見玄岱，號天漪、葵山，字斗膽、子新，幼名梅松，後改元泰，中年至晚年改名為玄岱，通稱新右衛門。出身於唐通事之家，師獨立性易、木下順庵，曾任六代幕府將軍德川家

前來慶賀德川家宣襲將軍位的琉球使節將其詩集帶往北京，請人品評。¹² 對此，琉球透過朝貢的機會將詩集交給出任清朝引禮通官的土通事鄭恪齋¹³，鄭恪齋則請其時任翰林院編修之姪鄭任鑰品評並作序。1714 年琉球利用遣使江戶的機會，將鄭任鑰之序文經由薩摩藩轉交給新井白石（新井白石，2014: 147-152）。惟如前所述，近世琉球王國爲了避免與日本的往來影響和清朝間穩定的封貢關係，施行對日關係隱蔽政策，因此鄭任鑰所見之詩稿已刪除與日本相關之內容，鄭任鑰因而誤以爲該詩稿爲琉球人之作品（劉序楓，2018: 118-12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交流可見清朝的土通事居中協助。土通事一職始於明代，據萬曆七年（1579）冊封副使謝杰所述，每逢使節出使琉球即由福建河口之人出任善夷語（琉球語言）之「土通事」，此外明初亦曾將福建河口之人賜予琉球並擔任「夷通事」（琉球通事）（謝杰，1970: 270）。此後，因夷通事利用出使的機會率人居留於福州形成琉球人聚落，導致負責其生活費用的福州官府負擔漸重，供給不穩，造成琉球人不滿，進而引發暴力衝突事件（陳文等，1966: 1114-1115）。而後隨著長住於福州的琉球人獲允入籍中國，並限制居留於福建的琉球人數，問題獲得改善（劉吉等，1966: 2022），土通事與夷通事之職亦更爲明確地區分爲冊封與進貢使節團之通譯官。成化年間土通事正式稱爲冠帶土通事，定額四名，職掌並細分爲引禮通事（一名）與譯語通事（三名），嘉靖二十五年（1546）革退一員，改爲三人（高歧，1939: 14）。

明清交替期間，因土通事謝必振兩度前往琉球招諭，土通事乃成爲清琉交涉的中介要角，其採用制度亦逐漸確立。清代的土通事員額沿襲明制爲三名，其職掌主要包括：(1)琉球進貢船抵達福州後之譯問、查驗符文執照；(2)引導琉球使節至柔遠驛並協助安排入住館舍；(3)監視柔遠驛內的琉球人有無

宣時期之儒官。其中木下之門，包含室鳩巢、新井白石、兩森芳洲等人。推測新井白石應是利用同門師兄弟的關係委託深見玄岱。深見玄岱的相關研究參見石村喜英（1973）。

12 深見玄岱與琉球間的往來現僅見其於 1715 年曾爲琉球人劉典禮留下一幅書法作品。

13 有關鄭恪齋之生平簡要紀錄現僅見於深見玄岱於《白石先生餘稿》之跋，其內容爲：「恪齋，姓鄭，名昂，字子頰，福州侯官縣人。」（新井白石，2014: 194-196）另據《歷代寶案》記載，鄭昂曾於 1713 年擔任通事（沖繩縣立圖書館編，1993: 300）。

商貿違禁貨物，每月通過提舉司向按察使報告，及琉球使節離港返國前有無違禁的搜檢作業；(4)伴送使節前往北京，協助參與朝貢儀禮；(5)引導琉球使節參與宴席；(6)監督琉球館的進貢貿易；(7)隨同冊封使節赴琉，與協助各項冊封儀禮；(8)琉球人漂抵中國時前往翻譯、製作供述書（高歧，1939: 23-28；沖繩縣立圖書館編，2003: 287-288；西里喜行，1997: 63-67），以及出任冊封使節出使琉球時，協助翻譯、冊封儀禮事宜的引禮通官等（徐葆光，2000；李鼎元，1971: 150-152）。

如上所述，由於清琉關係有賴於土通事居中交涉，因此琉球私下亦積極參與培育土通事，如提供「敷銀」之擔保金給土通事，給予土通事筆者「年例銀」（年俸），土通事筆者甚至曾向琉球借貸「拜借銀」等（西里喜行，1997: 60-63）。此外，土通事繼任時不僅須經由福防廳、布政使司、總督、巡撫的層層考核及同僚土通事擔任本籍保證人，琉球使節、通事之意見亦會影響土通事的任免，如嘉慶十六年（1811）土通事戴輝延誤使節上京時程，琉球使節毛光國即奏報要求革退（沖繩縣立圖書館編，2003: 287-288）。¹⁴綜上可見琉球與土通事間關係之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土通事的親族關係，亦是使琉球中介清日、清薩交流順利的因素之一。除前述土通事鄭恪齋順利中介新井白石與鄭任鑰間的交流外，土通事鄭任鐸¹⁵亦請求其曾任禮部郎中的叔父鄭晃¹⁶，為1720年琉球的謝恩副使程順則所編之《中山詩文集》作序（上里賢一編，1998: 41-47）。

鄭恪齋與鄭任鑰為叔姪，鄭晃與鄭任鐸亦為叔姪關係，而琉球冊封使節的引禮通官多由擔任土通事的謝家、鄭家及馮家之三大家系出任，又主要採

14 據西里喜行（2002）一文指出，另可見在琉球存留通事的保證下，出任土通事之例，相關紀錄見於沖繩縣立圖書館編（2003: 465-466）。以上有關明清時期土通事之內容主要參閱前引西里喜行（1997；2002）兩文。

15 據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卷一「渡海兵役」之記載，其於1719年出使琉球之引禮通官為鄭任鐸、馮西熊，其所記「鄭任鐸」應為「鄭任鑰」之誤。

16 鄭晃，字二瞻，福建長樂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進士，五十三年（1714）任禮部郎中。康熙五十七年（1718）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夢上疏表示，「學臣任滿之日，宜分別賢否，以昭勸懲」，而鄭晃因聲名不佳，遭革職（法式善編，1997: 369；覺羅勒德洪等奉勅修，1986: 726-1）。

父子相傳的世襲之制（西里喜行，2002: 32-33）。據此推測，1713 年曾出任土通事的鄭恪齋（沖繩縣立圖書館編，1993: 300）與 1719-1741 年間任土通事的鄭任鐸（西里喜行，2002: 32）¹⁷ 應屬同一家系，且極可能是父子，因此鄭任鑰與鄭任鐸應有親屬關係。此一親族關係亦與下文中徐葆光和木村探元間的交流相關。

二、徐葆光與木村探元

徐葆光，字亮直，號澂齋或澄齋，出身江南蘇州府長洲縣，1712 年於科舉殿試中以一甲第三名探花的優異成績，被授予翰林院編修之職（岩井茂樹，1999；曾煥棋，2005: 127-161；童宏民，2014: 25-30）。1719 年獲任命為琉球冊封副使，同年 5 月與正使海寶自福州出發，6 月抵達那霸，結束冊封儀禮後因等待回航季風，至隔年 2 月始返航。徐葆光停留琉球期間與琉球的官吏、文人多有交遊，留下許多詩文作品（徐葆光，2006；2007）。返國後徐葆光據其於冊封期間對琉球的觀察與蒐得之琉球文獻等，著作《中山傳信錄》一書，並留有《琉球國貢全圖》圖冊（李湜，2005；劉若芳，2007；孫欲容，2016）。

木村探元（1679-1767）為江戶中期薩摩藩狩野派畫師之代表，同時也是薩摩藩的御用畫師（坂田長愛編，1926；井上良吉，年份不明：82-90；井上良吉編，1915: 46-56；永田雄次郎、山西健夫，1998: 109-115；高津孝編，2014）。17 歲時其繪畫長才已受到矚目，1703 年，時年 25 歲的木村探元前往江戶，入狩野探幽之子，同時也是結合大和畫與漢畫，開創新江戶狩野派式樣的畫師狩野探信（守政，1653-1718）的門下（永田雄次郎、山西健夫，1998: 113-114）。木村探元修業兩年即返回故鄉，投身鹿兒島城本丸（城墉中最重要的建築主體）的圖繪工作（永田雄次郎、山西健夫，1998: 114-116），因其有功，受薩摩藩第四代藩主島津吉貴（1675-1747）之命剃髮，並

17 另西里喜行（2002）一文中推測鄭任鐸任職土通事之期間為 1726-1741 年，然據沖繩縣立圖書館編（1993: 569），1725 年即可見鄭任鐸任職土通事之紀錄，且如註 15 所述，鄭任鐸曾於 1719 年出任冊封使節徐葆光之引禮通官，因此其任職期間可再上推至 1719 年。

賜探元一名，¹⁸從此確立了木村探元於薩摩藩的畫師地位。

徐葆光和木村探元的交流為徐葆光於木村探元自畫像上題贊（圖 1）。木村探元自畫像是一幅絹本墨畫淡彩，畫旁有「淨德堂法淨居士自寫行樂圖」之落款與朱文圓印「山水生中厓貳笑」之落款章。「淨德堂」為木村探元修習禪學時所獲之號（坂田長愛編，1926: 13-14），木村探元的其他作品中雖未見同樣或相似的落款，但此後之作品中則常見「淨德堂」、「淨德堂法淨」、「淨德堂主人」、「淨德堂」等落款章。¹⁹「山水生中厓貳笑」之落款章除了此幅自畫像以外，目前僅見於「老子之圖」（鹿兒島市立美術館編，1987: 30）。

據自畫像上方徐葆光畫贊的落款記為「康熙庚子十月題於燕邸」，推測此幅畫應繪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以前，即木村探元 40 歲左右時之作品。²⁰

徐葆光於木村探元自畫像上的題贊為：

法淨居士，探元姓平。早通物理，馳譽丹青。澹泊寧靜，幽居寄情。筆墨自怡，外無所營。年近知命，禪性日瑩。誰歟媲美，輞川右丞。我思其人，如在蓬瀛。

詩中主要讚揚木村探元早通事理且早已享譽盛名，卻淡泊名利，寄情於筆墨；年近五十知命，禪性日增，無人可與之媲美，此如同年輕時居於陝西省輞川莊的尚書右丞王維，更稱頌木村探元就如同是身在仙境蓬瀛的仙人（山下廣幸，2003: 9）。

如前所述，自畫像旁的落款為「淨德堂法淨居士自寫行樂圖」，因此可以確定詩中的「法淨居士」指的正是木村探元。「探元姓平」則是因木村探元的先祖為鎌倉幕府最後一任執權北條高時之弟北條泰家，執權北條氏之始祖可追溯至桓武平氏（坂田長愛編，1926: 1；永田雄次郎、山西健夫，1998: 110-

18 探元一名似源自師探信或探幽。另改名之時間似在前往江戶之時，但仍待商榷（永田雄次郎、山西健夫，1998: 116-117）。

19 見「堯舜之圖」、「蘇東坡圖」、「群鶴圖」、「雲龍圖」、「鍾馗圖」、「天女富士圖」、「雪景山水」等，以上各圖收錄於鹿兒島市立美術館編，1987: 32, 39, 41, 88, 93, 95, 103。

20 此幅自畫像除了木村探元自筆版以外，另有下河邊行廉、小松甲川分別於 1856 年、1932 年摹寫之兩摹寫本，相關研究參見山下廣幸（2003）。



圖 1：
木村探元繪，「自画像」，
徐葆光題贊。

來源：木村探元，年份不明。
作者 2018 年攝於鹿兒
島市立美術館。

112)，故有此描述。另外，木村探元其他畫作中亦可見「薩陽侯司譜官平盛用作」、「平氏木村探元貳字紹」等落款與落款章。²¹ 擅筆墨、習禪學也與木村探元之經歷相同（坂田長愛編，1926: 13-14），惟年約四十的木村探元與徐葆光所述「年近知命」稍有落差。

前文提及，遭薩摩藩入侵，受其嚴密監管，並成為幕藩體制「異國」的琉球，為了避免與清朝間的封貢關係受到影響，故自清朝開海，大量商船前往長崎進行貿易後，即逐步採取嚴密的對日關係隱蔽政策。惟冊封使徐葆光於木村探元的自畫像上題贊，此舉極可能暴露琉日、琉薩關係，那麼徐葆光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基於何種考量題贊？推測應與徐葆光、程順則、木村探元三人間的交遊有關。

程順則，字寵文，久米村人，1683年以勤學的身分前往福州留學四年，1689、1696、1706、1719年分別以接貢存留通事、北京大通事、進貢副使正議大夫、謝恩使紫金大夫之身分前往清朝，亦於1714年出任掌翰使一職，隨同慶賀七代將軍家繼襲位的琉球慶賀使節團前往江戶，且於1719年出任久米村最高官職——久米村總役（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46-547）。

程順則與木村探元間的交遊始於1714-1715年程順則出使江戶期間。1713年因幕府將軍襲位、尚敬王即位，琉球派遣以與那城王子和金武王子為首的慶賀、謝恩使節前往江戶，使節團於1714年5月26日自那霸出發，同月30日抵達薩摩藩山川港，8月11日朝見薩摩藩主島津吉貴，9月9日自薩摩出發前往江戶，10月27日抵大阪，11月26日到達江戶，至12月21日離開江戶為止，曾先後三度進江戶城進獻琉球國王書翰並拜領德川將軍之回覆書翰與賜物，期間並前往參拜祭祀德川家康的東照宮。使節一行人於1715年2月21日回到薩摩，3月18日自山川出發返國，3月24日抵達那霸（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47）。

出使期間程順則謁大雄山東照宮時，住持曾出示木村探元所繪之「雪堂

21 見於「風竹圖」（鹿兒島市立美術館編，1987: 41）、「鞅修復之圖」（永田雄次郎、山西健夫，1998: 124）。

燕遊草圖」，程順則鑑賞後稱木村探元之畫有唐李營丘之風、通神佳手（坂田長愛編，1926: 10）。《雪堂燕遊草》為程順則於1696年出任北京大通事前往中國，往返福州與北京時歌詠名勝的漢詩集，現存有1714年奎文館主人瀨尾源兵衛之新刻版。推測是木村探元閱覽了在日流傳的《雪堂燕遊草》後，繪製「雪堂燕遊草圖」。可惜該圖佚失，目前僅見傳錄於《島津國史》、《名護親方程順則資料集》中，程順則於該圖題贊之經緯：

甲午永夏，予隨星槎抵薩州，從故事虔謁大雄山，拜東照宮。禮訖則見住持僧正公，僧正款待遠人，欣然而出平氏探元所畫之雪堂燕遊草圖示予，且命題筆。予受而展閱其畫圖。氣韻瀟灑，覺有李營丘之風，殆是所謂通神佳手者歟。予恐將下里巴人語褻瀆妙畫，見笑大方，為固辭焉。僧正曰：「滄海萬里，朔南相隔，子今奉使至扶桑，親獲勝會，豈非奇緣耶。吾求子之題筆，惟欲記奇緣而已。」於斯不能，方命而題之。

越月，東籬濃豔，金英方郁時，我太守公率中山王使赴江都，僧正亦同道入洛。在途中以燕遊圖呈覽太守公，公一見而大喜，則傳教令使探元再畫之，予亦奉令為題焉。竊思以予之覆瓿噴飴之物，備黃堂清玩，雖可深愧，亦是千載一時，誠為予之榮光者也，故將題畫始末並記於此。

時正德五年歲次乙未三月上巳日

琉球國中山王府慶賀典翰史程順則書於薩陽驛樓

（坂田長愛編，1926: 10-11）

據上所述，程順則於前往江戶途中閱覽了「雪堂燕遊草圖」，當時東照宮住持要求程順則於畫上題贊，然程順則以自己為通俗之人，題贊恐褻瀆畫作為由婉拒。隨後琉球使節一行前往江戶途中，住持將「雪堂燕遊草圖」呈覽予薩摩藩主島津吉貴。島津吉貴見後，即令木村探元再繪製一幅「雪堂燕遊草圖」，並要求程順則於畫上題贊。

此外，1714年12月琉球使節踏上歸途，於隔年1月抵達草津驛時，曾

任攝政、太政大臣之近衛家熙前往草津驛並請求程順則作詩文²²（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54），又出示木村探元所繪之「中山花鳥圖」，要求程順則於圖上題贊。²³

以上主要為程順則於木村探元之畫作上題贊的間接交流，兩人直接交遊的契機則須等到程順則至京都伏見時，島津吉貴令程順則回到薩摩後暫留一段時日，以便木村探元為其作畫，並要求程順則於畫上題贊以備清玩。1715年2月程順則抵達鹿兒島後，其他使節皆陸續返航，程順則獨留鹿兒島由木村探元為之作畫，至3月15日程順則始乘回航船隻，18日自山川啓航，24日返抵那霸（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57）。²⁴

徐葆光與程順則兩人之交遊則始於徐葆光出使琉球期間。1718年6月，以海寶、徐葆光為首的冊封使節團抵達琉球後，身為久米村總役，擔任接待冊封使節總負責人的程順則前往天使館拜訪徐葆光。對此，徐葆光留下了以下的詩作：

陪臣朔望至館起居贈紫金大夫程順則字寵文，工詩，前充貢使。至京，有《燕臺集》。

海外初逢有故情，當年職貢日邊行。舊遊曾賦皇居壯，朝士猶傳白雪聲。異域相親惟使日，重溟難隔是詩名。紫巾鶴髮來迎客，眾裏知君心已傾。（徐葆光，2006: 199）

據《程氏家譜》記載，徐葆光前往琉球之前，透過知曉琉球之事的侍講鄭任鑰得知程順則為中山第一人才，並且指出程順則出任朝貢使節時，即已展現優異的詩文能力。²⁵也因此詩中第一句便表示，雖是初次相逢，卻有遭逢故

22 分別為〈寄贈物外樓隱君子四首〉、〈物外樓記〉，其中〈物外樓記〉和當時致贈的「孔林楷杯」現藏於京都陽明文庫。

23 除了獻給近衛家的「中山花鳥圖」以外，木村探元另繪製一份獻給島津家，但兩原本今皆不存，現存有五摹本，相關研究見柴田光彥（2007）及近藤壯（2000；2006）。

24 此畫見於「チャイナタウン展：もうひとつの日本史：博多・那覇・長崎・横浜・神戸」實行委員會編，2003: 40。

25 「戊戌之秋，余奉使中山，將出都，侯官鄭侍講任鑰送余。鄭素熟中山事，余問中山人才，

友之感，同時提到程順則出使時曾經遊歷皇城，並留下優美的詩句。徐葆光在詩中接著表示，雖然大海阻隔，但無阻其盛名，此行得以相見，甚感歡喜。

而後，又因程順則致贈盆松，徐葆光再作〈紫金大夫程順則送盆松報謝一首〉，以示感謝之意（徐葆光，2006: 228）。惟此次的冊封使節團因攜帶過多貨物，以致無法順利銷貨，引發「評價事件」，後經由蔡溫居中協調，事件始落幕（楊仲揆，1993）。此事亦影響到徐葆光與程順則兩人之交流，即：

既至中山，與大夫相識甚謹。後人役輩方以貨市事溷，大夫深避不出，蹤跡遂疎。（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57）

由於冊封使節團於琉球期間的貿易活動「評價貿易」，亦是久米村總役程順則負責的職務之一，程順則因評價事件避而不出，與徐葆光之間的交遊也因此疏遠。然徐葆光回國時仍可見程順則贈詩相送：

奉送 徐太史澂齋還朝

春風回暖送君旋，一點雲飄入遠煙。萬里簡書歸闕下，半江彩鷁到門前。張騫槎自天邊轉，蘇軾文從海外傳。莫道歸裝無長物，盡收景物入詩篇。

紫金大夫程順則 拜具

（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54）

詩中未見離別的哀傷之情，因程順則被任命為謝恩副使，隨冊封使節團一同前往清朝。謝恩使節一行人於 1720 年 3 月抵達福州柔遠驛後，隔月出發前往北京，至 8 月始抵北京展開謝恩事宜，10 月離開北京，1721 年 2 月抵達福州柔遠驛，6 月 7 日自五虎門啓航返國，同月 11 日抵達那霸（那霸市企

侍講首以大夫程君順則龍文先生為對，且云：大夫前充貢使，入都，工詩文，善著作。（下略）」（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57）徐葆光稱鄭任鑰「素熟中山事」，此應是基於前述鄭任鑰與土通事鄭恪齋、鄭任鐸間的親族關係，使其得以熟知琉球之事。

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49)。

惟程順則停留北京期間公務繁重，加上清朝對外國使節進行嚴密的管制，無法擅自離開館舍（沈玉慧，2011: 162-165），直至完成謝恩公務後離開北京前，程順則以上京途中購於天津的「朱文公墨寶」軸，向徐葆光求跋，兩人始於北京再度展開交流：

（前略）入貢至京，又格於例，閉館中不遣出，雖日望足音杳然。冬仲將行，始遣通事鄭君持尺卷來，乃朱子大字書也。上有前使林莆田舍人題額，後見鄭侍講跋語。蟲粉剝蝕，萬里之行，尚以自隨，知之其嗜好於此深矣。朱子大字書學曹操，奸雄磊落之概，忽為正氣明性之人摹寫發揮，峻增突兀，溢乎行墨，氣象迥別，此古人善於脫化處也。大夫素馴謹，性情恬適，而乃寶此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己，遂題數語歸之。侍講方視學江南，大夫水驛所由，僕中途邂逅，尚其以鄙言示之，不知其有當乎未也。康熙庚子十月望日跋於燕京邸舍 長洲徐葆光

（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1980: 557）

另因隔日程順則準備離京返國，徐葆光亦題〈送琉球謝 封使紫金大夫程順則歸國十首〉，詩中稱揚程順則是琉球第一人才，其所作之詩不遜於東國朝鮮，並記程順則朝貢之際前往省父親墓之事，著有《燕遊集》、學記（〈廟學記略〉）、官表（《琉球國中山王府官制》），兼記琉球針路、怡山院行禮、久米村有兩天妃宮、琉球官生入北京國子監就讀，以及程順則於北京參加謝恩儀禮等事，最後是前往琉球冊封時遊歷各地之往事（徐葆光，2006: 300-302）。²⁶

徐葆光在木村探元自畫像上的落款為「康熙庚子十月題於燕邸」，徐葆光題贈予程順則的〈朱文公墨寶跋〉落款為「康熙庚子十月望日跋於燕京邸

26 徐葆光與程順則兩人之情誼並未因程順則返國而劃下句點，如徐葆光曾於 1734 年 3 月提筆寫下程順則之居所「立雪堂」三字（平川信幸等編，2008: 180），惜程順則於同年 12 月過世，且目前未見程順則對於徐葆光之題字留下的相關描述，因此無從得知徐葆光之題字是否順利地交付至程順則手中，但由此仍足見兩人情誼之深厚悠長。

舍」，地點同樣是徐葆光於北京之宅邸，時間皆為康熙庚子（1720）10 月，程順則極有可能利用與徐葆光的交遊關係，在向徐葆光求跋時，同時要求其於木村探元自畫像上題贊。²⁷

肆、清琉日文化交流途徑的形成

透過以上的交流事例可知，清琉日間的交流途徑隨著東亞局勢與清琉日關係的變化，逐漸建構成形。即 1609 年琉球遭薩摩藩入侵並受其直接統治後，初期薩摩藩對琉球採取同化政策，然隨著透過琉球中介對明交涉失敗，薩摩藩的統治方針轉變為禁止琉球人使用日本名，使琉球成為表面的「自主之國」，另一方面則透過訂立各項遣使名目，以有效監管琉球，琉球因而一年遣使薩摩藩數次，琉薩間的往來途徑確立。此外，自 1634 年起琉球於幕府將軍襲位、琉球國王即位之際派遣慶賀、謝恩使前往江戶，同年亦成為幕藩體制中的「異國」，至 1850 年為止遣使江戶 18 次，往來途徑因此延伸至江戶幕府，琉薩日間的交流途徑也就逐漸成形確立。

明清交替期間，因琉球同時與南明、三藩、清朝等各方勢力往來，薩摩藩與江戶幕府即仰賴琉球取得中國情報。琉球為了避免與清朝及反清勢力的兩面外交，影響和清朝間的朝貢冊封關係，因而積極地對清朝展現忠誠之意。與此同時，清朝亦須有忠誠的朝貢國以強化政權之權威和對外往來之穩定，故面對琉球的請封，清朝即派遣汪楫、林麟焜出使琉球，並首開先例特賜御筆匾額，清琉間的朝貢冊封關係乃逐漸穩定。之後隨著接貢船制度的確立（蔡溫，1972: 123-124；富田千夏，2014）、派遣勤學至福州等，北京—福州—琉球的往來途徑確立，加上前述琉薩日間的交流，琉球居中扮演關鍵中介的北京—福州—琉球—薩摩—江戶之交流途徑確立，成為薩摩藩、江戶幕府取得清朝情報、商品、文物、技術等的重要中介管道。此時亦可見 1663-1695

27 除了中介徐葆光與木村探元間的交流活動以外，另可見薩摩藩士相良玉山透過程順則取得福州文人王登瀛之序文（池田溫，2002），以及近衛家熙透過程順則取得王登瀛字畫作品之紀錄（綠川明憲，2011: 43），此將另文探討。

年出任負責琉球與異國相關事務的薩摩藩勝手方家老新納久了（1619-1695）（鹿兒島縣歷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1989: 499；林匡，2015: 30）利用職務之便，於冊封使節汪楫出使琉球期間，委人將其書法作品交由汪氏品評題詩。²⁸

如前所述，隨著清琉薩日關係及清朝的統治趨於穩定，江戶幕府亦開始崇尚清朝之文化風俗，因而可見新井白石透過琉球使節將其詩集帶往北京，請人品評的文化交流之舉。其中自 1714 年起久米村人開始出任江戶使節，亦負責接待冊封使節、出任朝貢使節，故得以與清朝使節、隨員、官吏等交遊往來。此亦是先後出任掌翰使而與木村探元建立交遊關係，接待冊封使節徐葆光，並以謝恩使之姿前往清朝的程順則，得以促成徐葆光於木村探元自畫像上題贊的重要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清琉薩日間的文化交流，除了仰賴琉球中介之外，清朝的土通事亦於其中扮演不可忽視的中介角色，例如在土通事鄭恪齋的中介下，成功地促成新井白石與鄭任鑰的交流。鄭任鑰與鄭恪齋、鄭晃與鄭任鐸的親族關係不僅促成了琉球使節程順則與京官鄭晃間的交遊，土通事與琉球間的緊密關係亦成爲冊封使節出使前取得琉球情報的途徑。

透過琉球中介的清日往來雖爲間接交流，然藉由土通事的親族關係及與冊封使節的交遊往來，促成了日、薩與清朝京官間的交流活動，爲清日提供了不同的文化交流渠徑。

伍、結語

本文透過分析清日間之交流事例，考察清琉日交遊網絡建立的背景及其過程，可知薩摩藩爲了強化對琉球的統治，訂立多項遣使名目，進而建立起

28 〈題籐（藤）原新納久了先生草書長卷〉：「戲烏騰猿論久虛，秋蛇春蚓意何如。山風乍定海雲碎，掇出籐（藤）原處土書。」（汪楫，2006: 65）另，據收錄於《新薩藩叢書》中之〈称名墓志〉、〈人物傳備考附錄〉記載，新納久了精通性理之說，師小幡勘兵衛景憲（《新薩藩叢書》中記爲「小畑勘兵衛景憲」，應爲讀音相同之誤記）之甲州流軍學流派，創薩摩藩甲州流，亦能賦詩，並擅草隸（新薩藩叢書刊行會編，1971: 33, 331）。

薩琉間的往來途徑。1634 年起琉球於幕府將軍襲位、琉球國王即位之際派遣慶賀、謝恩使前往江戶，並於同年被視為幕藩體制中的「異國」，中琉日間的往來途徑逐漸成形。歷經明清交替，琉球蒐集、傳遞中國情報的機能強化，隨著清琉關係穩定，接貢、派遣官生、勤學等制度亦一一建立，加上 1714 年起久米村人開始出任江戶使節，透過琉球中介的北京—福州—琉球—薩摩—江戶的交流途徑於是確立。

此外，透過分析清日交流事例具體掌握參與其中的人員，可知清琉日間的交流網絡，除了琉球以外，清朝的土通事、與土通事具親族關係的京官，以及冊封使節皆是清琉日交遊網絡中的一員。加上琉球出資參與培養土通事，甚至影響土通事之任免，可知琉球與土通事之間關係緊密。面對來自江戶幕府之幕臣新井白石欲與清朝文人進行文化交流之要求時，為了避免暴露與江戶幕府、薩摩藩間的關係，琉球即在土通事的協助下，透過親族關係來因應，顯示土通事的親族關係也成為冊封使節出使前取得琉球情報的途徑之一。由此可知，土通事及其親族關係乃是串聯清琉日交流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另值得注意的是，此一交流途徑中的冊封使節，不僅是參與其中的交流者，同時也是國家代理人、外交現場的第一線人員，其對日交流活動的因應和態度，亦一定程度地反映清朝的對日政策。如汪楫出使前曾請示康熙皇帝，若在冊封期間，遇有日本等海外諸國欲向清朝朝貢時，該如何因應？康熙帝指示，若有此一情況，當向禮部報告並待協議後的結果（庫勒納等奉敕撰，2009: 6077-6080）。然汪楫和林麟焜返國後，對於出使期間曾與實為倭人的七島郡司會面（汪楫，2000b: 12），及汪楫對薩摩藩家老新納久了的書法品評作詩等事，均未奏報，僅代琉球奏請允陪臣子弟入國子監就讀（覺羅勒德洪等奉勅修，1986: 201-1）。²⁹

此外，如綜合考量清朝仰賴透過對日貿易取得鑄造貨幣的洋銅，並藉此確保稅收（陳國棟，2005: 264-274），³⁰ 加上清朝曾於 1718 年第三度出兵

29 曾任琉球冊封副使的李鼎元與朝鮮隨員柳得恭談及琉日關係時，亦曾提及琉球極為隱諱臣屬日本之事（柳得恭，2001: 204）。

30 此外，劉序楓（1999: 305-306）亦指出對日貿易的主要口岸乍浦佔浙海關稅收約 40%。

準噶爾前施行南洋海禁，以避免陷入西北與東亞海域腹背受敵的險境（柳澤明，1999: 79-80），可見清朝或基於財政、整體疆域之安全、對外往來和平之穩定等各項考量，至 19 世紀中後期為止，未因日本曾要求華商私載醫師、退役武將赴日及日琉關係，對日琉採取積極的因應措施（沈玉慧，2018: 160-170）。然清日之間仍可能因商貿、文化交流等活動，觸發衝突或齟齬，此時恐須由商貿、交流現場第一線的商人、使節、通事進行折衝，其中協助並參與清琉日交流的土通事、冊封使節，或可說是維持清日和平安定往來的中介者，惟此一論述尚須持續蒐羅相關交流事例進行更深入之分析考察。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上里賢一（編）

- 1998 《中山詩文集·校訂本》。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Uezato, Kenichi (ed.), 1998, *The Chuzan Collection of Poetry and Prose (Revision)*. Fukuoka: Kyushu University Press.）

成島司直（編）

- 1806 《琉球錄話》，文化3年序抄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Narushima, Motonao (ed.), 1806, *Ryukyurokuwa*, Held at National Diet Library, Japan.）

吳繼志

- 2013 《質問本草》，見高津孝、陳捷（主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下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Wu, Ji-zhi, 2013, *Medicinal Herbs and Plants for Internal Use*, in Takashi Tahatsu and Jie Chen (eds.), *Liuqiu Wangguo Hanwen Wenxian Jicheng*, Vol. 2.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李 湜

- 2005 〈以圖鑒史——有關琉球的清宮畫卷〉，《紫禁城》2005(2): 92-117。（Li, Shi, 2005, “Reading History from Pictures: Roll Paintings about Ryukyu in the Qing Palace,” *Forbidden City* 2005(2): 92-117.）

李鼎元

- 1971 《使琉球記》，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292 種，《清代琉球紀錄集輯》，下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Li, Ding-yuan, 1971, *Record of the Mission to Ryukyu*, in Economic Research Office of Bank of Taiwan (ed.), *Taiwan Literature Series*, No. 292, *Qingdai Liuqiu Jilu Jiji*, Vol. 2. Taipei: Economic Research Office of Bank of Taiwan.）

沈玉慧

- 2007 〈琉球情報傳遞角色之形成及建立——以明清時期中日間的往來交涉為中心〉，見

- 辛德蘭 (主編),《第十屆中琉歷史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頁 161-189。臺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Shen, Yu-hui, 2007, "Formation of Ryukyu's Role in Intelligence Transmission: Focused on the Exchange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pp. 161-189 in De-lan Xin (ed.), *Proceedings of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Ryukyu Relations*. Taipei: Sino-Ryukyuan Cultural Economic Association.)
- 2011 〈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的琉球情報收集〉,《漢學研究》29(3): 155-190。(Shen, Yu-hui, 2011, "How Tribute Missions from Joseon to Qing China Collected Information about Ryukyu," *Chinese Studies* 29(3): 155-190.)
- 2018 〈從對日情報之蒐集與運用分析清朝對日政策〉,見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頁 143-178。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Shen, Yu-hui, 2018, "On Qing's Foreign Policy toward Japan-Concepts in Collecting and Using Japanese Information," pp. 143-178 in Shih-feng Liu (ed.),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cross the Asian Waters*. Taipei: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 汪 楫
- 2000a 《冊封疏鈔》,見黃潤華、薛英(編),《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上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Wang, Ji, 2000a, *Cefeng Shuchao*, in Run-hua Huang and Ying Xue (eds.), *Guojia Tushuguan Cang Liuqiu Ziliao Huibian*, Vol. 1.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 2000b 《使琉球雜錄》,見黃潤華、薛英(編),《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上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Wang, Ji, 2000b, *Shiliuqiu Zalu*, in Run-hua Huang and Ying Xue (eds.), *Guojia Tushuguan Cang Liuqiu Ziliao Huibian*, Vol. 1.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 2006 《觀海集》,見王茵(選編),《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三編》,上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Wang, Ji, 2006, *Guanhaiji*, in Han Wang (ed.), *Guojia Tushuguan Cang Liuqiu Ziliao Sanbian*, Vol. 1.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 沖繩縣立圖書館(編)
- 1992 《歷代寶案·校訂本》,第 1 冊。那霸:沖繩縣教育委員會。(Okinawa Prefectural Library (ed.), 1992,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reasure (Revision)*, Vol. 1. Naha: Okinawa Prefectural Board of Education.)
- 1993 《歷代寶案·校訂本》,第 3 冊。那霸:沖繩縣教育委員會。(Okinawa Prefectural Library (ed.), 1993,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reasure (Revision)*, Vol. 3. Naha: Okinawa Prefectural Board of Education.)
- 2003 《歷代寶案·校訂本》,第 9 冊。那霸:沖繩縣教育委員會。(Okinawa Prefectural Library (ed.), 2003,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reasure (Revision)*, Vol. 9. Naha: Okinawa Prefectural Board of Education.)
- 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編)
- 1980 《那霸市史·資料篇》,第 1 卷,第 6 冊,家譜資料 2。那霸:那霸市企畫部市史編輯室。(City History Editorial Office, Department of Planning of Naha City (ed.), 1980, *The History of Naha City, Ziliao Pian*, Vol. 1, *Jiapu Ziliao* 2. Naha: City History Editorial Office, Department of Planning of Naha City.)

法式善（編）

- 1997 《清秘述聞》，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四年（1799）刻本影印本，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17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Fa, Shi-shan (ed.), 1997, *Qing Mi Shu Wen*,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Vol. 1178.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柳得恭

- 2001 《燕臺錄》，見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卷60。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Ryu, Deuk-gong, 2001, *Yantai Lu*, in Ki-jung Rim (ed.), *Yanhanglu Quanji*, Vol. 60.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孫欲容

- 2016 〈徐葆光《琉球國貢全圖》與清代琉球形象的建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6(1): 61-81。(Sun, Yu-jung, 2016, “Xu Bao-guang’s Liuqiu Guogong Quant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Ryukyu in the Qing Dynasty,”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6(1): 61-81.)

庫勒納等（奉敕撰）

- 2009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聯經。(Kurene et al., 2009, *Qijuzhuce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aipei: Linking.)

徐葆光

- 2000 《中山傳信錄》，見黃潤華、薛英（編），《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中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Xu, Bao-guang, 2000, *Chuzan Denshinroku*, in Run-hua Huang and Ying Xue (eds.), *Guojia Tushuguan Cang Liuqiu Ziliao Huibian*, Vol. 2.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 2006 《海舶三集》，見王茵（選編），《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三編》，上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Xu, Bao-guang, 2006, *Haibo Sanji*, in Han Wang (ed.), *Guojia Tushuguan Cang Liuqiu Ziliao Sanbian*, Vol. 1.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 2007 《奉使琉球詩》，見王春瑜（編），《中國稀見史料》，第1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Xu, Bao-guang, 2007, *Feng Shi Liuqiu Shi*, in Chun-yu Wang (ed.), *Zhongguo Xijian Shiliao*, Vol. 1.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高岐

- 1939 《福建省舶提舉司志》，重鉛印本。(Gao, qi, 1939, *Fujian Shibotijusi Zhi*, reprint edition.)

曹永和

- 2000 〈明洪武朝的中琉關係〉，見曹永和，《中國海洋史論集》，頁191-232。臺北：聯經。(Tsao, Yung-ho, 2000, “The Sino-Ryukyu Relations during the Hongwu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pp. 191-232 in Yung-ho Tsao, *Zhongguo Haiyangshi Lunji*. Taipei: Linking.)

球陽研究會（編）

- 1972 《球陽》。東京：角川書店。(The Study Group of Kyuyo (ed.), 1972, *Kyuyo*. Tokyo: Kadokawa Shoten.)

陳文等

- 1966 《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Chen, Wen et al., 1966, *Ming Yingzong Shilu*.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陳國棟

- 2005 〈清代前期 (1644-1842) 海洋貿易的形成〉, 見陳國棟, 《東亞海域一千年》, 頁 258-298。臺北: 遠流。(Chen, Kuo-tung, 2005, "Formation of Seatrade System in Early Qing Dynasty (1644-1842)," pp. 258-298 in Kuo-tung Chen,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East Asian Sea*. Taipei: Yuan-Liou.)

黃立芸

- 2015 〈琉球畫家殷元良 (座間味庸昌, 1718-1767) 的中國繪畫學習〉, 《藝術學研究》16: 1-25。(Huang, Li-yun, 2015, "The Ryukyū Painter In Genryō (Zamami Yōshō, 1718-1767) and His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s," *Journal of Art Studies* 16: 1-25.)

黃宗羲

- 1993 《日本乞師紀》, 據梨洲遺著彙刊影印。成都: 巴蜀書社。(Huang, Zong-xi, 1993, *Riben Qishiji*, photocopied edition. Chengdu: Bashu Press.)

楊仲揆

- 1993 〈從天使在琉之供奉及貿易看徐葆光與蔡溫之關係〉, 見琉球中國關係國際學術會議 (編), 《第四回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 琉中歷史關係論文集》, 頁 501-514。那霸: 琉球中國關係國際學術會議。(Yang, Zhong-kui, 1993, "Relations between Xu Bao-guang and Cai W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ffering to Imperial Envoy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p. 501-514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Ryukyū Relations (ed.),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Ryukyū Relations*. Nah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Ryukyū Relations.)

劉吉等

- 1966 《明憲宗實錄》。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Liu, Ji et al., 1966, *Ming Xianzong Shilu*.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劉序楓

- 1999 〈財稅與貿易: 日本「鎖國」期間中日商品交易之展開〉, 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 (編), 《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 頁 275-318。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Liu, Shih-feng, 1999, "Trade and Customs Duties: The Expansion of Sino-Japanese Trade in Commodit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National Seclusion," pp. 275-318 in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Group of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d.), *Public Finance and Modern History*.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2002 〈清代環中國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以清日兩國間對外國難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為中心 (1644-1861)〉, 見朱德蘭 (主編),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 8 輯, 頁 173-238。臺北: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Liu, Shih-feng, 2002, "Investigating Shipwrecks over the Waters Surrounding China in the Qing Period: Focused on the Assistance Offered by Qing and Japan to Foreign Refugees and Their Repatriation Systems 1644-1861," pp. 173-238 in Te-lan Chu (ed.), *Essays in Chinese Maritime History*, Vol. 8. Taipei: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 2018 〈從「韃靼」到「大清」: 十七、八世紀日本幕府對清朝認識的建構〉, 見劉序楓 (主編), 《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 頁 97-141。臺北: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Liu, Shih-feng, 2018, "From 'Dada' to 'Da Qing': Construct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Qing Dynasty by Japanese Bakufu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pp. 97–141 in Shih-feng Liu (ed.),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cross the Asian Waters*. Taipei: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劉若芳

- 2007 〈徐葆光與所繪琉球圖〉，見沖繩縣文化振興會史料編集室（編），《第八回琉球・中国交渉史に関する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頁 277–294。那霸：沖繩縣立圖書館。(Liu, Ruo-fang, 2007, “Xu Bao-guang and Ryukyutu,” pp. 277–294 in Historiographical Institute of Okinawa Prefectural Cultural Promotion Association (ed.), *Miscellany of the Eighth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Sino-Ryukyu Relations*. Naha: Okinawa Prefectural Library.)

蔡 溫

- 1972 《中山世譜》，見橫山重、東恩納寬惇、伊波普猷等（編纂），《琉球史料叢書》，第 4 卷。東京：東京美術。(Cai, Wen, 1972, *Chuzan Seifu*, in Shigeru Yokoyama, Kanjun Higashionna, and Fuyu Iha et al. (eds.), *Series of Ryukyu Historical Materials*, Vol. 4. Tokyo: Tokyo Bijutsu.)

鄭潔西

- 2010a 〈萬曆二十年傳入明朝和朝鮮的日本豐臣秀吉死亡情報〉，見松浦章（編著），《明清以來東亞海域交流史》，頁 43–68。臺北：博揚文化。(Zheng, Jie-xi, 2010a, “Intelligence of Toyotomi Hideyoshi’s Death Transmitted into the Ming Dynasty and Chosen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Wanli Reign,” pp. 43–68 in Akira Matsuura (ed.),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Maritime Exchanges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ipei: Boyyoung Culture.)
- 2010b 〈萬曆二十一年潛入日本的明朝間諜〉，《學術研究》2010(5): 115–124。(Zheng, Jie-xi, 2010b, “The Spies of the Ming Dynasty Slipped into Japan in 1593,” *Academic Research* 2010(5): 115–124.)

薛 明

- 2014 《清前期的中日關係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Xue, Ming, 2014, *Study of Sino-Japan Relations during Early Qing Period*. Shenyang: Liaon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謝 杰

- 1970 《琉球錄撮要補遺》，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28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Xie, Jie, 1970, *Liuqiulu Cuoyao Buyi*, in Economic Research Office of Bank of Taiwan (ed.), *Taiwan Literature Series*, No. 287. Taipei: Economic Research Office of Bank of Taiwan.)

覺羅勒德洪等（奉勅修）

- 1986 《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Ledehong et al. (eds.), 1986, *Shengzu Renhuangdi Shil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B. 外文部分

上原兼善

- 1981 〈明末清初の動乱と琉球〉，見上原兼善，〈鎖国と藩貿易：薩摩藩の琉球密貿易〉，

頁 67-72。東京：八重岳書房。(Uehara, Kenzen, 1981, “The Disturbance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and Ryukyu,” pp. 67-72 in Kenzen Uehara, *Sakoku and Trade by Han: Satsuma Han with Ryukyu Smuggling*. Tokyo: Yaedake Shobou.)

大庭脩（編著）

1967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Oba, Osamu (ed.), 1967, *Studies in Chinese Books Imported in Japan in the Edo Period*. Osaka: Institute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Studies, Kansai University.)

山下廣幸

2003 〈木村探元自画像の模写作品について〉，《黎明館調査研究報告》16: 1-10。(Yamashita, Hiroyuki, 2003, “The Reproduction of Kimura Tangen’s Self-Portrait,” *Bulletin of Reimeikan, Kagoshima Prefectural Museum of Culture* 16: 1-10.)

井上良吉

年份不明 《薩藩画人伝》，鹿兒島縣立圖書館藏抄本。(Inoue, Ryokichi, n.d., *Satsuhan Gazinden*, Held at Kagoshima Prefectural Library.)

井上良吉（編）

1915 《薩藩画人伝備考》。出版者不明。(Inoue, Ryokichi (ed.), 1915, *Satsuhan Gazinden Bikou*. Unknown Publisher.)

木土博成

2016 〈琉球使節の成立——幕・薩・琉関係史の視座から〉，《史林》99(4): 525-557。(Kido, Hironari, 2016, “The Establishment of Ryukyuan Embass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Shogunate, Satsuma and Ryukyu,” *The Shirin* 99(4): 525-557.)

木村探元

年份不明 《自画像》，徐葆光題贊。個人收藏，現存於鹿兒島市立美術館。(Kimura, Tangen, n.d., *Kimura Tangen’s Self-Portrait*. Personal Collection, Currently in Kagoshima City Museum of Art.)

平川信幸

2019 〈琉球絵画の歴史について〉，《國華》125(1): 27-38。(Hirakawa, Nobuyuki, 2019, “History of Ryukyu’s Paintings,” *Kokka* 125(1): 27-38.)

平川信幸等（編）

2008 《甦る琉球王国の輝き》。那覇：沖縄縣立博物館・美術館。(Hirakawa, Nobuyuki et al. (eds.), 2008, *Blaze in Revived Ryukyu Kingdom*. Naha: Okinawa Prefectural Museum and Art Museum.)

永田雄次郎、山西健夫

1998 《薩摩の絵師たち》。鹿兒島：春苑堂。(Nagata, Yujirou and Takeo Yamanishi, 1998, *The Artists in Satsuma*. Kagoshima: Shunendou.)

石村喜英

1973 《深見玄岱の研究：日中文化交流上における玄岱伝と黄檗独立禪師伝》。東京：雄山閣。(Ishimura, Kiei, 1973, *Study of Fukami Gentai: An Aspect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from Gentai Den and Obaku Tokusyu Zenshi Den*. Tokyo: Yuzankaku.)

池田温

2002 〈「梅花百詠」をめぐる日・琉・清間の交流〉，見池田温，《東アジアの文化交流

史》，頁 394-412。東京：吉川弘文館。(Ikeda, On, 2002, “The Cultural Exchange around Japan, Ryukyu and Qing about ‘Meihua Baiyong’,” pp. 394-412 in On Ikeda,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East Asia*.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西里喜行

1997 〈中琉交渉史における土通事と牙行（球商）〉，《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紀要》50: 53-92。(Nishizato, Kiko, 1997, “A Study of the Role of Tutongshi (土通事) and Yahang (牙行) or Qiushang (球商)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yukyu,” *Bulletin of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50: 53-92.)

2002 〈土通事・謝必振とその後裔たち——中琉交渉史の一側面〉，《琉球大学教育学部紀要》60: 25-42。(Nishizato, Kiko, 2002, “A Study on Xie Bizhen (謝必振) as Tutongshi (土通事、an Interpreter) and His Descendan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Empire and the Ryukyu Kingdom,” *Bulletin of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60: 25-42.)

坂田長愛（編）

1926 《木村探元小傳》。東京：公爵島津家臨時編輯所。(Sakata, Choai (ed.), 1926,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Kimura Tange*. Tokyo: Koshaku Shimazukei Temporary Editorial Office.)

赤崎貞幹

1797 《琉客談記》，夏威夷大學寶玲文庫藏抄本。出版者不明。(Akazaki, Teikan, 1797, *Account of the Conversations with Visitors from Ryukyu*, Hawley Collection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Unknown Publisher.)

赤嶺守

2004 《琉球王国：東アジアのコーナーストーン》。東京：講談社。(Akamine, Mamoru, 2004, *The Ryukyu Kingdom: Cornerstone of East Asia*. Tokyo: Kodansha.)

岩井茂樹

1999 〈徐葆光撰「中山伝信録」解題〉，見夫馬進（編），《使琉球録解題及び研究》，増訂版，頁 91-105。宜野灣：榕樹書林。(Iwai, Shigeki, 1999, “Commentary on Xu Bao-guang’s *Chuzan Denshinroku*,” pp. 91-105 in Susumu Fuma (ed.), *Shiryukyuroku Bibliography and Research Work*. Ginowan: Youju Shorin.)

林 匡

2015 〈薩摩藩家老の系譜〉，《黎明館調査研究報告》27: 1-43。(Hayashi, Tadashu, 2015, “The Genealogy of Chief Retainers of the Satsuma Domain,” *Bulletin of Reimeikan, Kagoshima Prefectural Museum of Culture* 27: 1-43.)

林春勝、林信篤（編）

1958 《華夷變態》，上冊。東京：東洋文庫。(Hayashi, Harukatsu and Nobuatsu Hayashi (eds.), 1958, *Kai Hentai*, Vol. 1. Tokyo: Toyo Bunko.)

近藤壯

2000 〈江戸時代中期の公家文化における画家の研究——近衛家熙と「中山花木図」をめぐる〉，《鹿島美術財団年報》17 別冊: 439-458。(Kondo, Tsuyoshi, 2000, “Study of Aristocratic Painters during the Middle Edo Period—Around the Konoe Iehiro and ‘Chuzan Kaboku-zu’,” *The Kajima Foundation for the Arts Annual Report* 17: 439-458.)

2006 〈程順則着賛本「中山花木図」に関する一考察：（財）海洋博覧會記念公園管理

財団所蔵本を中心に)、《沖繩文化研究》32: 179-201。(Kondo, Tsuyoshi, 2006, “A Study on ‘Chuzan Kaboku-zu’ with Tei Junsoku’s Painting Inscriptions: Focusing on the Properties of Ocean Exposition Commemorative Park Management Foundation,” *Journal of Okinawa Cultural Studies* 32: 179-201.)

前田舟子

- 2014 〈久米村の勤学一覧表(清代)〉, 見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編), 《久米村(クニンダ)——琉球と中国の架け橋》, 頁69-73。那覇: 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Maeta, Syuko, 2014, “The List of Kuninda’s Kingaku (Qing Dynasty),” pp. 69-73 in Okinawa Prefectural Museum and Art Museum (ed.), *Kuninda—A Bridge between Ryukyu and China*. Naha: Okinawa Prefectural Museum and Art Museum.)

室鳩巢

- 1991 《鳩巢先生文集》, 見杉下元明(編), 《近世儒家文集集成》, 第13卷。東京: べりかん社。(Muro, Kyuso, 1991, *Collected Works of Muro Kyuso*, in Motoaki Sugishita (ed.), *Kinsei Juka Bunshuu Suusei*, Vol. 13. Tokyo: Perikansha.)

柳澤明

- 1999 〈康熙56年の南洋海禁の背景——清朝における中国世界と非中国世界の問題に寄せて〉, 《史観》140: 72-84。(Yanagisawa, Akira, 1999, “The Background of an Edict to Control Overseas Trade and Emigration in 1717—A Preliminary Study on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Non-Chinese World in the Qing (清) Empire,” *The Historical Review* 140: 72-84.)

柴田光彦

- 2007 〈「中山花木図」新攷 程順則の讚をめぐって——ハワイ大学蔵宝玲文庫本と首里城公園蔵本から〉, 《沖繩學》10(1): 105-139。(Shibata, Mitsuhiro, 2007, “A New Study of the Chuzan Kaboku-zu: On the Poetry of Tei Junsoku: From the Book of the Sakamaki/Hawley Collection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Library and the Book of Properties of Shuri Castle Park,” *Okinawagaku* 10(1): 105-139.)

眞榮平房昭

- 2001 〈琉球の中国貿易と古美術品の輸入〉, 見MOA美術館(編), 《特別展 尚王家と琉球の美展》, 頁114-118。熱海: MOA美術館。(Maehira, Fusaaki, 2001, “Ryukyuan Trade with China and the Import of Antique,” pp. 114-118 in MOA Museum of Art (ed.), *Special Exhibitions for the Sho Royal Family and Ryukyu*. Atami: MOA Museum of Art.)
- 2006 〈琉球王国に伝来した中国絵画——唐物の輸入と王権をめぐる視点〉, 《沖繩文化》40(2): 60-88。(Maehira, Fusaaki, 2006, “Chinese Paintings Introduced into the Kingdom of the Ryukyus —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overeignty and Introduction of Articles from China,” *The Okinawa Bunka* 40(2): 60-88.)
- 2007 〈清国を訪れた琉球使節の見聞録——「琉客談記」を中心に〉, 見沖繩縣文化振興會史料編集室(編), 《第八回琉球・中国交渉史に関する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 頁123-142。那覇: 沖繩縣立圖書館。(Maehira, Fusaaki, 2007, “The Memoir of Ryukyuan Embassies Who Visited Qing—Focusing on *Ryukaku Tanki*,” pp. 123-142 in Historiographical Institute of Okinawa Prefectural Cultural Promotion Association (ed.), *Miscellany of the Eighth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Sino-Ryukyuan Relations*. Naha:

Okinawa Prefectural Library.)

紙屋敦之

1980 《幕藩制国家の琉球支配》。東京：校倉書房。(Kamiya, Nobuyuki, 1990, *The Baku-Han System State and Governance of Ryukyu*. Tokyo: Azekura Shobou.)

2013 〈寛政八年琉球使節の江戸上りについて〉，《藝能史研究》202: 9-21。(Kamiya, Nobuyuki, 2013, “A Ryukyu Mission Paid a Visit to Edo in 1796,” *History of the Performing Arts* 202: 9-21.)

荒野泰典

1988 〈近世日本の漂流民送還体制と東アジア〉，見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頁 117-157。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Arano, Yasunori, 1988, “The Repatriation System of a Castaway during Early Modern Japan and East Asia,” pp. 117-157 in Yasunori Arano, *Early Modern Japan and East Asia*.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馬成芬

2017 《唐船法帖の研究》。大阪：清文堂。(Ma, Cheng-fen, 2017, *Study of Tosen Houjou*. Osaka: Seibundo.)

高良倉吉

1987 〈琉球・沖縄の歴史と日本社会〉，見朝尾直弘等（編），《日本の社会史》，第1巻，《列島内外の交通と国家》，頁 354-384。東京：岩波書店。(Takara, Kurayoshi, 1987, “History of Ryukyu-Okinawa and Japanese Society,” pp. 354-384 in Naohiro Asao et al. (eds.), *History of Japanese Society*, Vol. 1. Tokyo: Iwanami Shoten.)

高津孝

2010 〈「琉球産物志」から「質問本草」へ〉，見高津孝，《博物学と書物の東アジア：薩摩・琉球と海域交流》，頁 11-57。宜野灣：榕樹書林。(Takatsu, Takashi, 2010, “From *Ryukyu Sanbutsushi* to *Shitsumon Honzo*,” pp. 11-57 in Takashi Takatsu, *East Asia of Natural History and Books: Satsuma and Ryukyu and Sea Area Exchange*. Ginowan: Youju Shorin.)

高津孝（編）

2014 《木村探元と武家のたしなみ：平成二十六年度鹿児島大学附属図書館貴重書公開》。鹿児島：鹿児島大學附属図書館。(Takatsu, Takashi (ed.), 2014, *Kimura Tangen and Military Governments's Interest: The Exhibitions of Kagoshima University's Rare Books in 2014*. Kagoshima: Kagoshima University Library.)

富田千夏

2014 〈琉球王国接貢制度の研究：清代における「接貢」に関わる人々の往還の分析：家譜資料を中心に〉，琉球大學大学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比較地域文化専攻博士論文。(Tomita, Chinatsu, 2014, “Study of Ryukyu Kingdom's Seko System: The Analysis of People Who Involved in 'Seko' during Qing Dynasty: Focusing on Family Lineage Documents,” Ph.D. Dissertation,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深瀬公一郎

2004 〈近世琉球における上国使者の派遣：「上国使者一覧年表」と統計データの分析〉，見村井章介（編），《8-17世紀の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人・物・情報の交流：海域と港市の形成、民族・地域間の相互認識を中心に》，下冊，頁 198-241。

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Fukase, Koichiro, 2004, “The Ryukyuan Messengers to Satsuma during Early-Modern Ryukyu: ‘The Chronology of Ryukyuan Messengers to Satsuma’ and the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Data,” pp. 198-241 in Shosuke Murai (ed.), *The Interchange of the People, Products, and Information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8th and 17th Centuries: Focusing on the Formation of Sea Area and Port-Cities, Mutual Recognition between Nationalities and Regions*, Vol. 2. Tokyo: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鹿兒島市立美術館（編）

1987 《木村探元展：近世薩摩画壇の隆盛》。鹿兒島：鹿兒島市立美術館。(Kagoshima City Museum of Art (ed.), 1987, *Kimura Tangen Exhibition: Prosperity of a Modern Period Satsuma Painting Circle*. Kagoshima: Kagoshima City Museum of Art.)

鹿兒島縣歷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

1984 《鹿兒島縣史料・舊記雜錄後編 4》。鹿兒島縣出版。(Reimeikan, Kagoshima Prefectural Center for Historical Material (ed.), 1984, *Kagoshima Prefecture Historical Collection, Kyukizatsuroku Kouhen*, Vol. 4. Published by Kagoshima Prefecture.)

1985 《鹿兒島縣史料・舊記雜錄後編 5》。鹿兒島縣出版。(Reimeikan, Kagoshima Prefectural Center for Historical Material (ed.), 1985, *Kagoshima Prefecture Historical Collection, Kyukizatsuroku Kouhen*, Vol. 5. Published by Kagoshima Prefecture.)

1989 《鹿兒島縣史料・舊記雜錄拾遺・諸氏系譜 1》。鹿兒島縣出版。(Reimeikan, Kagoshima Prefectural Center for Historical Material (ed.), 1989, *Kagoshima Prefecture Historical Collection, Kyukizatsuroku Shuui, Shoshikeifu*, Vol. 1. Published by Kagoshima Prefecture.)

喜舍場一隆

1993 《近世薩琉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Kishaba, Kazutaka, 1993,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Satsuma Domain and Ryukyu Kingdom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okyo: Kokushokankokai.)

曾煥棋

2005 《清代使琉球冊封使の研究》。宜野灣：榕樹書林。(Tseng, Huan-qi, 2005, *Study of Qing's Missions to the Ryukyu Kingdom*. Ginowan: Youju Shorin.)

渡邊美季

2012 《近世琉球と中日關係》。東京：吉川弘文館。(Watanabe, Miki, 2012, *The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Japan in Early Modern Ryukyu*.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2018 〈隱蔽政策の展開と琉清日關係〉，《琉大史學》20: 51-70。(Watanabe, Miki, 2018, “Early-Modern Ryukyu and the Concealment Policy,” *Ryudai Review of History* 20: 51-70.)

童宏民

2014 〈冊封副使徐葆光の眼光——「奉使琉球詩」の分析を中心に〉，琉球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比較地域文化專攻博士論文。(Tung, Hung-min, 2014, “Qing's Vice-Envoy Xu Bao-guang's Discernment—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Fengshi Liuqiu Shi*,” Ph.D. Dissertation,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黃立芸

- 2013 〈孫億とその花鳥画について：東アジア絵画史の観点から〉，植松瑞希（譯），《大和文華》125: 1-14。(Huang, Li-yun, 2013, "Sun Yi and His Bird-and-Flower Paintings from the Viewpoint of East Asian Painting History," Mizuki Uematsu (trans.), *Semi-Annual Journal of Eastern Art* 125: 1-14.)

新井白石

- 2014 《白石先生餘稿》，1715年序刊本，見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4輯，集部，第23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Arai, Hakuseki, 2014, *Hakuseki Sensei Yokou*, in Publication Committee of Yuwai Hanji Zhenben Wenku (ed.), *Yuwai Hanji Zhenben Wenku*, Vol. 4. Chongqing: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新薩藩叢書刊行會（編）

- 1971 《新薩藩叢書》，第3卷。東京：歴史圖書社。(Sin Satsuhan Sousho Publication Society (ed.), 1971, *Sin Satsuhan Sousho*, Vol. 3. Tokyo: Rekishitoshosha.)

緑川明憲

- 2011 〈豫楽院：近衛家熙公年譜稿（四）〉，《京都大學國文學論叢》26: 39-56。(Midori-kawa, Akinori, 2011, "Yorakuin: The Chronicle Manuscript of Konoe Iehiro (4)," *Kyoto Daigaku Kokubungaku Ronsou* 26: 39-56.)

増田勝機

- 1999 《薩摩にいた明国人》。鹿児島：高城書房。(Masuda, Katsuki, 1999, *The Men of Ming Dynasty in Satsuma*. Kagoshima: Takishobou.)

鶴田武良

- 1993 《宋紫石と南蘋派》，《日本の美術》，第326號。東京：至文堂。(Tsuruta, Takeyoshi, 1993, *Song Zishi and Nanpin School, Japanese Art*, No. 326. Tokyo: Shibundo.)

「チャイナタウン展：もうひとつの日本史：博多・那覇・長崎・横浜・神戸」実行委員会（編）

- 2003 《チャイナタウン展：もうひとつの日本史：博多・那覇・長崎・横浜・神戸》。福岡：福岡市博物館。(Executive Committee of Chinatown Exhibition: Another Japanese History: Hakata, Naha, Nagasaki, Yokohama, and Kobe (ed.), 2003, *Chinatown Exhibition: Another Japanese History: Hakata, Naha, Nagasaki, Yokohama, and Kobe*. Fukuoka: Fukuoka City Museum.)

The Qing-Japan Cultural Exchange by Ryukyu's Intermediary Route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Yu-hui S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invaded by the Satsuma Domain in 1609, Ryukyu started to take a strict concealment policy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Standing between Qing China and Japan, Ryukyu helped to transmit intelligence, commodities, antiquities, and technologies, among other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Satsuma and the Shogunate at Edo, and even coordinated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Japan. Different from the transmission of intelligence and objects, cultural exchange heavily depends on social networks. Indeed, involvement of some Han Chinese interpreters and officials working for the Qing government has been found in these activi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Ryukyu's intermediary role, examines the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Japan that involved Chinese participation and Ryukyu's coordination, analyzes the roles of interpreters and officials,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xchange network between China, Ryukyu, Satsuma and Japan.

Key Words: early modern Ryukyu, intermediary exchange, Han Chinese interpreters, Qing investiture envoys, exchange network